

東方研究

文叢



單周堯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東方研究 文叢

單周堯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西方研究 / 單周堯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325-5872-8

I. ①東… II. ①單… III. ①東西文化-比較文化-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G0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59137 號

東西方研究

單周堯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1194 1/16 印張 40.75 插頁 3 字數 1,100,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978-7-5325-5872-8

I·2319 定價: 168.00 元

主編

單周堯

編輯 *

陳萬成

陳遠止

鄧昭祺

馮錦榮

梁紹傑

許振興

楊永安

編輯助理 *

林恩妮

謝向榮

* 以漢語拼音為序

目 錄

序	(1)
傳教士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	
——《聖教入川記》的宗教與文化觀點	陳學霖 (1)
西學中用	
——重讀劉若愚先生《中國詩學》有感	王靖宇 (24)
略論近年西方學者的甲骨文研究	朱歧祥 (30)
二十一世紀簡帛研究的新視野	
——從楚簡《老子》研究探討東西方學者的古籍整理方法	鄧佩玲 (35)
“三武之福”研究之一：日本聖武天皇《建國分寺之詔》寫定時間	
再議	童長義 (48)
摩醯首羅與唐宋祇神	張小貴 (60)
杜甫與“現實主義”的接受	黃自鴻 (68)
宋朝歷史形象的塑建	
——費正清《中國新史》的啓示	許振興 (79)
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	
——以谷登堡活字印刷作對照	張高評 (88)
西方學者對金海陵王的評價	曾震宇 (115)
范禮安與澳門聖保祿學院：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柱	張偉保 (131)
翻譯·政治·教爭：龍華民譯《聖若撒法始末》再探	李爽學 (139)
試論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在華活動	耿 昇 (165)
分歧與融合	
——金聖嘆與新批評的文論比較	黃偉豪 (182)
明末清初的明史建構活動	錢茂偉 (198)
清儒王心敬太極說之人文思想芻議	汪學群 (212)
寶鑑正反照	
——論《紅樓夢》薛蟠的表和裏	孫愛玲 (221)
從寬鬆到緊縮：1802－1840 越南阮朝基督教政策研究	鄭永常 (229)
“公堂寶案薪傳遠，流裔遺珍辨鏡新”	
——從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所藏印尼華人“吧國公堂”匾聯碑	
記與檔案探論移民史實	賴貴三 (249)
從《遐邇貫珍》的“喻言一則”到《英華青年》的英譯“中國故事”	
——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	李雄溪 (267)

西醫東傳史的一個側面：“腦筋”一詞的來歷	陳萬成 羅婉薇 (275)
穆藕初與西方企業管理之引進	鄭潤培 (293)
西學東來與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編纂	龔 敏 (306)
梁啟超的中西文化觀及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位置	王昌偉 (316)
從知識結構轉移看梁啟超思想的內核價值與深層變化	周昌龍 (327)
席勒美學對於王國維“境界”論的影響	鄭芳雄 (350)
“魯迅與尼采”研究之歷史與發展 (1918-2007)	張釗貽 (366)
茅盾作品中的“歐化”表達	陳家駿 (383)
二十世紀初《新著國語文法》的“西體中用”	謝耀基 (395)
簡論桑格夫人節育觀對中國“多子多福”觀的衝擊	何泉達 (404)
西方漢學家筆下的東方彈弦樂器	
——文化交融的痕迹與傳統樂器譯名的西化和漢化	洪 濤 (418)
飲食文化的形成與時空發展過程	
——以廣東菜系為例	梁國常 (434)
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中國與西方	黃維樑 (445)
“觀點”(Point of View)概念的跨語境應用	
——兼談中西方小說批評傳統差異	陳 樂 柯思仁 (453)
世界性的同步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	蕭 映 (461)
上海淪陷時期女作家小說中的文化撞擊	余婉兒 (473)
魚尾獅混體文化象徵與意象初探：以兩首新華、新英詩歌為例	胡月寶 (492)
星·光	
——詩人之思與宗教符號	陳惠英 (509)
論東西文化發展的時差：以羅門“燈屋”的美學思想為例	區仲桃 (519)
陳染《另一隻耳朵的敲擊聲》之孤獨感研究：以西方精神分析為	
理論建構	史 言 (529)
《崑曲演唱理論叢書》成書的啓示	余 丹 古兆申 (551)
曉雲法師的繪畫藝術與國際文化交流	陳娟珠 (559)
Hegel's and Karl Marx's Construct of China	Adrian Hsia (572)
Deep China: A Travelling Metaphor	Douglas Kerr (591)
The Sino-French Connection and World War One	Paul J Bailey (600)
Chen Hengzhe and the Transformative Uses of History: Some	
Comments on her Affiliations and her <i>Short History of the</i>	
<i>European Renaissance</i>	Denise Gimpel (612)
A Pioneering Comparatist and the Architectonics of Zong	
Baihua's Aesthetics	Francis K. H. So (628)

序

本書所載論文，都曾於 2007 年 10 月 5—7 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舉辦的“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其中陳學霖教授的《傳教士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聖教入川記〉的宗教與文化觀點》和王靖宇教授的《西學中用——重讀劉若愚先生〈中國詩學〉有感》，是大會的主題演講。其餘論文，都於會後經過隱名評審然後採用。

這次研討會是爲了紀念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八十周年而舉辦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創始於 1927 年，初名中文系，八十年來，人才輩出，駁駁然成爲卓具國際聲譽之學術重鎮。

爲了紀念學院成立八十周年，自 2006 年 12 月起，中文學院舉辦一系列學術講座，詳情如下：

	講 者	講 題
第一講	許嘉璐教授	傳統中華文化的現代意義
第二講	余光中教授	《桃花扇》——情人淚與烈士血
第三講	白先勇教授	青春版《牡丹亭》的文化現象
第四講	痖弦教授	成爲一個詩人的條件
第五講	查良鏞教授 陳萬雄博士	中國歷史的發展
第六講	鄭愁予教授 王良和博士	新詩的教與學

除講座外，中文學院還出版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周年學術論文集》，以及港大校友詩選《港大·詩·人》。

負責壓軸的是 2007 年 10 月 5—7 日舉辦的“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之學者多達 205 人，其中外地學者 117 人，香港本地學者 88 人，論文共 195 篇，內容包括語言、文字、歷史、文化、宗教、思想、文學、學術、翻譯、美學、

戲曲、繪畫，以及飲食、醫學、節育觀、企業管理等。

研討會由查良鏞學術研究基金贊助，籌備委員會組織如下：主席：單周堯教授；秘書：馮錦榮教授；委員：陳萬成教授、陳遠止教授、鄧昭祺教授、何冠彪教授、黎活仁教授、李家樹教授、李銳清教授、梁紹傑教授、廖明活教授、潘漢光教授、施仲謀教授、王愛和教授、謝耀基教授、許振興教授、楊永安教授、楊玉峰教授、余文章教授、鄭雅麗教授*。研討會會務組成員則包括：單周堯教授、馮錦榮教授、尚維瑞博士、陳以信博士、陳志明博士、何偉幟博士、劉淑貞女士、于昕先生、廖舜禧先生、孫雅玲女士、鄧思陽先生、周敬華先生、羅榮貴博士、崔文翰先生、黃志強先生、謝向榮先生、曾惠仙小姐、梁珊珊小姐、黃海星先生、李乾耀先生、周靜儀小姐、邵筱芳小姐、史言先生、明柔佑先生、黃正謙先生、謝雋曄先生、梁思樂先生、梁震海先生、黃俊賢先生、鄧靜小姐、杜政羨小姐、徐錦小姐、汪寶榮先生、李韻婕小姐、翁曉羽小姐、周家建先生、陳偉成先生。由於衆志成城，群策群力，研討會遂得以順利完成。對贊助者及研討會籌委會、會務組諸位之襄助，本人無任篆感。

本書之出版，承陳萬成教授、陳遠止教授、鄧昭祺教授、馮錦榮教授、梁紹傑教授、許振興教授、楊永安教授** 惠允出任編委，林恩妮小姐、謝向榮先生協助校對，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主任、阮幗儀博士諸位為論文之編輯、校對工作盡心盡力，本人謹致衷心謝意。

2011 年 11 月 26 日文農單周堯於香港大學

* 漢語拼音序。

** 同上。

傳教士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

——《聖教入川記》的宗教與文化觀點

陳學霖

引言

明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傳統史家目為“流賊”或“流寇”，現代中國史家譽為“農民起義”領袖的李自成（1606－1645）率領部眾佔據北京，思宗崇禎帝（朱由檢，1627－1644 在位）自縊於煤山，明朝覆亡。出身陝西延綏鎮軍，以犯法逃亡，人稱“黃虎”的張獻忠（1606－1646），於崇禎三年（1630）就地起事，號“八大王”，旋率部眾叛入山西，尋擾河北、陝西、河南。八年（1635），與李自成協議分道東下，數年間與官軍轉戰安徽、湖廣，返陝西後又出犯湖廣，於崇禎十七年正月進入四川。是年（清順治改元）八月，獻忠攻陷成都，十一月即皇帝位，國號大西，紀元大順，稱大西王（或秦王）。獻忠以蜀王府為宮，改成都為西京，用投降士人汪兆齡為左丞相，前朝知縣吳繼善為右丞相，設六部五軍督等官，隨分道攻略各州縣，大肆殺戮官民，血流成渠，慘虐無人理。兩年後（1646）棄蜀移兵陝西，又焚燒成都宮殿廬舍，並欲殺盡四川兵。同年十一月，出戰清兵時為流箭貫胸身亡，時年四十歲。吳偉業《綏寇紀略》、費密《荒書》、歐陽直《蜀亂》、彭遵泗《蜀碧》、佚名《客滇述》、《蜀記》及沈荀蔚《蜀難叙錄》等根據當時目擊，對張獻忠的殘暴酷虐，大量殺害無辜人民與夷城毀都，荼毒地方有沉重細膩的記述。乾隆官修的《明史》（1736）將李自成及張獻忠列入《流賊傳》，對其叛逆肆殺大張伐撻，便是根據這些資料。^①

半世紀前的中國史學界，基於政治形勢需要及深受階級鬥爭說的影響，在一窩蜂研究“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歷史下，對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兩位舊史學視為王朝的頭號逆賊，就必須作徹底的平反。從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關張獻忠的論著都朝向這個目標。他們的研究和評論集中於兩方面。首先是從演繹文獻資料著手，對於舊籍所載張獻忠的殘酷殺戮，一方面批判是出於士紳階級仇視農民起義軍的誣譏誇張，另一方面緣飾淡化說矛頭主要是指向地主、官僚等反革命階級，不是平民，又說死難是革命鬥爭過程中難免的犧牲，遇到難作解釋的情況則將史文刪節不談。此外是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強調張獻忠的猖獗動亂為“農民起

① 張獻忠的傳記見張廷玉等修纂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三〇九《流賊》，頁7969－7977。參北京汽車制造廠工人理論組《張獻忠傳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吳偉業《綏寇紀略》有《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其他有關張獻忠亂蜀的記載，分別收入清樂天居士（孫毓修）所編《痛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以及時人何銳等點校之《張獻忠剿四川實錄》（成都：巴蜀出版社，2002年）。摘錄史料見鄭天挺所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參任乃強《關於張獻忠史料的鑒別》，載《張獻忠在四川》（《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第二期）（成都：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編輯部，1981年2月），頁201－209。英文張獻忠小傳見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 I, pp. 37－38。

義”或“農民革命”的“反封建統治”的正義戰爭，將他塑造成為農民戰爭的傑出革命領袖、軍事家，或甚至為偉大的民族英雄。這一代史學家對糾正舊史記載的一些重疊錯誤，如釐清張獻忠殺人的數字，及四川多少人及那一類人如何被殺等爭議性問題不無貢獻，不過以意識形態政治需要掛帥扭曲歷史，作偏頗的人物評估，恐怕難免為時代淘汰。^①然則如果傳統記載難以盡信，是否有不同時代、從不同立場、不同文化角度著筆的史料？答案是有的，這就是本文要介紹的在四川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對張獻忠活動的記載。

自北京淪陷於李自成，一些較早進入中國傳道的天主教士都離開京師往各地避難，其中有兩位耶穌會士進入四川，在張獻忠進駐成都時滯留其地，近三年內（1644年初至1646年底）目睹張氏稱帝建國，殘殺民衆，焚城毀都，個人歷盡險阻，得以逃過死刑，事後將聞見筆之於書，留下珍貴的歷史記載。這兩位耶穌會士是意大利西沙里（Sicily）籍的利類思（Ludovico Buglio [1606-1682]）司鐸及葡萄牙籍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10-1677]）司鐸。安文思於1651年以葡文撰寫的《張獻忠記》（*Relação das tyrant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便是天主教士目擊張獻忠盤據四川活動的整體記錄。

利類思華字再可，十六歲加入耶穌會，崇禎十年（1637）來華。他先在江南傳教，後奉命進京襄助修曆，繼而應四川綿竹縣籍的內閣首輔劉宇亮的邀請，至四川傳教，成為在該地傳教的第一位教士。安文思華字景明，出生於葡萄牙一航海家庭，據悉是大航海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的後裔。他十六歲加入耶穌會，1634年到果阿（Goa），崇禎十三年（1640）來華，先在杭州傳教，後入四川協助利類思，在重慶等地活動。根據記載，1643年7月，張獻忠率部衆入川，二司鐸先往劉宇亮家鄉綿竹躲避，後又隱藏深山，但終為敵所獲，押解到成都。獻忠初時對兩位猶以禮待，命製造天文儀器，翻譯曆書，但張氏其人性好疑忌，喜怒無常，屢欲置二人於死地。二司鐸心懷惴惴，一日，上書謂曆理深奧，請准赴澳門延訪精通天文之士及搜求各種儀器，但獻忠疑其欲逃，扣押擬將之處死。惟猶未動手，忽報清兵摻入，獻忠不信，單騎出探，為流箭射死。利、安二司鐸為清兵所獲，得統帥肅親王豪格（1609-1648）識為泰西傳教士，送往北京，隨在京撰述在四川的經歷，送往教廷。^②

國人揭示安文思的書，最早是天主教史專家，徐光啓（1562-1633）的十二世孫徐宗澤（1886-1947），他在1947年7月在《東方雜誌》發刊的《張獻忠入川與耶穌會士》遺作，便提到1661年傳抄的《張獻忠記》。他在文章末段轉述耶穌會士描寫對張獻忠的印象說：“張獻忠為人甚聰明，與士卒同甘苦，自由談話，表顯坦白，溫情大量，慷慨態度，且嘗與屬下飲食。”這些話便是出自安文思的記載。（徐氏本人未親見其書，只從後出的天主教會所編的典籍摘要，但

① 上半世紀中國史學界對農民起義及農民戰爭的論著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外文評論見 James P.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Chinese Re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Atheneum, 1969)。關於張獻忠的研究，前期史學家以舊傳統尺度論述的有李文治《晚明民變》（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及臺灣學者李光濤之《明季流寇始末》（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1960與1980年代以農民起義觀點評述的論文甚多，重要論集專著有《張獻忠在四川》（《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第二期），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辯——兼析湖廣填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棟《張獻忠傳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及胡允恭《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等。英文論著見 James B. Parsons,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② 利、安二司鐸的傳記資料見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s. 59-60)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1934), Tome I, pp. 230-243, 251-255; 及 Joseph Dehergne, S. J. (榮振華) 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上冊，頁93-95及頁398-399。另參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台中：光啓出版社，1970年），上冊，頁81-87；及余三樂《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六章。

並非是後揭的《聖教入川記》。^① 安文思親撰的記錄有若干傳鈔本，其一藏於梵蒂岡的教廷圖書館，讀者不易獲見。美國 James B. Parsons 撰的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1970)，所引用安書的記載，都是出自兩種後出的類書的摘要，這便是耶穌會士馬匡國 (Martinus Martini [1643 - 1661]) 以拉丁文著述的中國史綱 *De bello Tartarico* (英譯為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London: Crook, 1654]，華譯為《韃靼戰記》)，和另一耶穌會士 Thomas I. Dunin Szpot 編纂的 *Collectanea Historiae Sinensis 1641 ad 1700* (1710)。^② 不過此二書亦不易見，因此國人早年論述張獻忠史事的，都無緣參考傳教士對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屠城的記載。

民國初年駐四川的法籍天主教士古洛東 (François Marie Joseph Gourdon)，曾根據其所獲得的安文思著作的傳鈔本，出版一本華文書籍，記述張獻忠據蜀稱王的事迹，書名《聖教入川記》(下稱“古書”)，提供利、安二司鐸目擊張獻忠亂事的史料。此書為鉛印本，不分卷，撰於 1918 年，同年由重慶聖家書局印行。古洛東約生於 1840 年，1866 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派來中國，到重慶從事教會活動，1930 年左右卒於其地。他先後辦理川東教區大、中、小修院，自任大修院長，創辦並負責公義書院 (後改聖家書局)，印刷拉丁文《文範》和中文聖書。^③《聖教入川記》流通不廣，今日所見本係四川省圖書館藏本，1981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重版。作者自序說：“迨十餘年前余下上海時，耶穌會神父慨然出一鈔本以示余，內載有利類思及安文思二公在四川開教情形，頗為詳細。余甚為欣慰，不覺精神為一振，復向各方徵求其餘事實，即本書所記載者也。”由此可知，該書內容出自上海耶穌會神父傳抄的安文思《張獻忠記》，而古洛東據以演述，並加注釋。不過，古司鐸稱言未親睹原書，深以為恨 (“古書”頁 52 注釋 48)。前人曾懷疑其書原以外文撰寫，由上海教會翻譯，不過根據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說明》，此書是古洛東用中文撰寫的。^④《聖教入川記》主要記敘明末天主教傳入四川的情形、清初四川地區教徒的概況、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位司鐸及其他外國教士的活動，以及他們與張獻忠的交往；對於張氏的殘暴嗜殺、其對天主教義的認識與對天文地理的興趣、天地球儀的製作、佛道教徒對天主教的迫害，以及四川民衆反洋教的鬥爭等，都有描述。最重要的是鉤畫了張獻忠的個性及愛惡，其亂蜀屠城，耶穌會士對其印象及評價，以及明末清初四川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情況，提供了不少他書見不到的資料，因此，這是一本研究張獻忠與明末清初四川歷史的由外國人以華文撰述的重要史籍。在此書出版的前後，中國學者論述張獻忠的，都曾提及其書，但因其內容不大配合政治需要，因此，只摘用其有利於張獻忠的記述，並未客觀地採用耶穌會士的第一手資料作比較研究。^⑤

最近，荷蘭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榮休漢學教授 Erik Zürcher (許理和) 撰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Buglio and Magalhães at the court of Zhang Xianzhong, 1644 - 1647” 一文，刊於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誌) 50 (2002)，詳細討論兩位司鐸在四川張獻忠管治下的活動。

① 見徐宗澤《張獻忠入川與耶穌會士》，《東方雜誌》43: 13 (1947 年 7 月)，頁 45 - 48；參袁庭棟《張獻忠傳論》，頁 180，注①。徐氏所引安文思的報告題名 *Relação das tyrantias obradas por Cang-hr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e anno 1651*，據 Louis Pfister, p. 255。但徐氏未見其書，頁 47 引文係據 Colombel, S. 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ou-se-we, 1895 - 1905), Tome I, pp. 463 - 464 所揭資料摘要譯述。

② 見 Parsons,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p. 170n, pp. 196 - 199。

③ 古洛東司鐸事迹略見古洛東著《聖教入川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說明》，頁 1 - 2。

④ 詳《聖教入川記·序》，頁 1，及《出版說明》，頁 1 - 6。

⑤ 見任乃強《張獻忠屠蜀記》，《關於張獻忠史料的鑒別》，載《張獻忠在四川》，頁 117, 127, 131, 201 - 202；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頁 49, 96；袁庭棟《張獻忠傳論》，頁 97, 106, 109, 180；胡允恭《李自成張獻忠起義》，頁 190 等。

Zürcher 教授這篇論著根據的是安文思的原著鈔本和利類思稍後撰寫的簡單自叙本。他說安文思在 1651 年送往羅馬教廷一本關於他們二人在四川的經歷的報告，題名 *Relação da perda e destituição da Provincia e Christiandade de Su Chuen e do que os pes. Luis Buglio e Gabriel de Magalhães passarão em seu cativ*。這便是 Martini 據以摘錄的原本。看來前述的《張獻忠記》（*Relação das tyrant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可能是這報告的別名，兩者同為一書。此外，利類思又撰述一份只有三頁紙的關於他們二人的行述，標題為“*Abrégé de la vie et de la mort du R. Père Gabriel de Magaillans*”（1677）。二者只有鈔本，現藏於梵蒂岡教廷圖書館。^①許理和教授雖然將《聖教入川記》列入參考書目，但顯然未廣泛利用。由於許教授只將資料演述，並未大量徵引原文，而筆者則未有緣閱讀上述鈔本，所以本文只是匯集各種西文摘要，參以《聖教入川記》，作一比較驗證及評述，使各家對張獻忠的先後記載得以匯聚一堂，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不同觀點，及與中文記載作一比較。

其實，前年以九十高壽歸主的華裔耶穌會士名史學家陳綸緒神甫（Albert Chan, S.J. [1915–2005]），據《華裔學誌》53（2005）所刊登的訃聞，曾以英文譯述安文思及利類思司鐸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遺下約二百頁手稿，但未悉已全部完成否，希望不久該教會學者能整理出版，如是則學界將有完整資料研究此一駭世的歷史事件。^②

紀 事

安文思的《張獻忠記》（下稱“安書”）和後來古洛東據以演述的《聖教入川記》（下稱“古書”），都從描述利類思司鐸於 1640 年（即崇禎十三年）到四川傳教開始。司鐸行前得四川在京的首輔東閣大學士劉宇亮照應，宇亮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時任禮部尚書；他是在欽天監主持修曆的名傳教士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的友人，善待聖教。利司鐸抵步後，寓居劉閣老（“Liu Colao”）府第，得到官府的護佑和士紳的敬重，很快便展開傳教事務。翌年，他從新奉教中選出三十人付聖洗，其中有一名伯多祿（Pierre）者，據說是皇室子弟，可能是封藩於四川的蜀王朱椿（1371–1423）的後裔，但不知原名。未幾，安文思司鐸從杭州來襄助教務，二人自此一起誠心敷傳聖教。其間曾因當地僧道徒衆嫉妒，勾結仇視西人之王府太監，毀謗二司鐸妖言惑衆，為禍國家，訴諸刑司，請將二人治罪，幸得一已受洗之武官名多默（Thomas）閭督者營救，率領士兵制止陷害教士，後又得同情聖教的吳繼善縣令陳說，二司鐸亦作申辯書，官府始將滋事者繩之於法。（按吳繼善太倉人，崇禎十年 [1637] 進士，後投張獻忠，拜官禮部尚書，見後。）自道黨被治罪後，聖教在川始略享太平，可惜維時不久。北京旋為流賊攻破，崇禎帝自縊，

① Erik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Buglio and Magalhães at the court of Zhang Xianzhong, 1644–1647”, *Monumenta Serica* 50: 355–374 (2002)。關於安文思司鐸資料的來源，見 p. 373 引 *Relação: Gabriel de Magalhães, Relação da perda e destituição da Provincia e Christiandade de Su Chuen e do que os pes. Luis Buglio e Gabriel de Magalhães passarão em seu cativ*, report sent to Manuel de Azevedo; dated May 18, 1649; ms. ARSI Jap. Sin. 127, 36 fols (簡稱 *Relação* [中文稱“安書”])。

② 見 James Tong, “Albert Chan, S.J., 1915–2005”, *Monumenta Serica* 53: 478–500 (2005)。陳神甫為明史及目錄學專家，已出版的英文專書有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2)，及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ponica-Sinica* (Amonk, N. Y.: M. E. Sharpe, 2002)。有關安文思及利類思二司鐸的傳記資料，見是書 Index, pp. 600, 613 所揭示。

明朝覆亡，各省大亂，張獻忠旋入四川。^①

“古書”記四川民衆聞京師被陷，驚惶不已，又聞張獻忠率領黨衆無算，沿途殺戮，不日即抵成都，愈加恐慌。此時蜀王朱其澍不籌禦敵之計，反連日集議，互相擾亂爭執不休，以致賊衆如入無人之境，直逼成都。^② 二司鐸見事不佳，將聖堂交澳門人安當看管，逃難至劉閣老家鄉綿竹暫住，得其家人襄助逃難，初欲買舟由大江出省到南京，但因各要隘已被獻忠派人防守，只得逃入山中躲避。茲錄“古書”記載如下：

成都百姓無日不聞獻賊殘虐，慘殺無辜，愈爲恐怖，人心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城中百姓見大難將臨，各皆逃走，教友亦多奔避山中。利、安二司鐸見事不佳，亦作暫避之計，即將聖堂託安當看守。按安當先生，係廣東澳門人，前同二位神父來川者，爲人忠厚，深洽二位神父之心故也。二位神父妥備一切，即往綿竹縣，寓劉閣老府第。此時劉閣老已死矣。利、安二神父在綿竹亦受危險，蓋是時土匪作亂，互相報仇，數千土匪擁入綿竹，搜殺兼施，全城大亂。閣老之家人二名，恐二位神父落入亂民之手，將遭不測，乃於更深夜靜，用索將二位神父同安當先生由城牆上吊下，逃往他方。安當先生因成都王府中人肇事，致將神父住所毀損，乃逃往神父處，故此亦在綿竹。利、安二神父黑夜奔馳，大受艱辛。次日，即欲買舟由大江出省到南京。不幸張獻忠在各河道及各要隘均已派人防守，不准人民往來，二位神父不得已逃奔山中，遇一城而居焉。^③

至於張獻忠進入成都的情況，“古書”述云：“一千六百四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張獻忠大排隊伍，進入成都，隨即稱王。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遑。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爲暴雨之後，雲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爲，能任國事。於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不知獻忠性情殘暴，稍有不順，狂怒隨之，或刑或殺，視人命如草芥。故當時之人因受虐不過，均稱之爲人面獸心。後利、安二位司鐸見獻忠殘虐如此，殊覺不安，屢被召見，皆先預備，如赴殺場。”對於當時官民的迎逢心態及獻忠率性殘暴，視人命如草芥，其記載都與漢文所述相同。“古書”繼言二司鐸“見獻忠殘虐，殊覺不安，屢被召見，皆先預備，如赴殺場”，^④ 諒是實錄。至於利、安司鐸出見張獻忠，係由縣令吳繼善推舉。“安書”稱吳繼善（Ukixen）原爲縣令，投身張獻忠後，推升爲禮部尚書，“出於對二神父的長久友誼和敬愛，上書‘虐王’（tyrant），極端稱讚天主教義、他們兩人的修行和歐洲的科學，並陳說朝廷若果得到他們的服務，對人民和整個國家（指“大西國”）當有很大裨益”云云。^⑤ “古

① 見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pp. 357–358 及“古書”頁 1–17。《劉宇亮傳》見《明史》卷二五三頁 6536–6537；參“古書”頁 2–3 注 5。《湯若望司鐸傳》詳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Tome I, pp. 162–182；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上冊，頁 599–600；Alfons Vā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Köln, 1933; rpt.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V, 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1991)；魏特（Alfons Vāth）著，楊丙晨譯《湯若望司鐸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另參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 1–15；96–98；余三樂《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第五章。佚名的閩督事迹詳“古書”，頁 6–11。吳繼善傳見鄭澐《啓禎野乘》（北平：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6 年），卷十二，頁 16 下–17 下；又參“古書”，頁 11，注 15。

② 蜀王朱至澍傳見《明史》卷一一七《諸王二》，頁 3581。傳云：“蜀獻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自椿以下四世七王，幾百五十年……恭王奉銓……（萬曆）四十三年薨，子至澍嗣。崇禎末，京師陷，蜀尚無恙。未幾，張獻忠陷成都，合宗被害，至澍率妃妾投於井。”

③ “古書”，頁 17–18。

④ “古書”，頁 18–19。

⑤ 見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pp. 358–359，據 *Relação*, p. 5。

書”則載：“先是，繼善被簡為禮部長官，乃上書獻忠，極讚二位司鐸才德兼優，現駐附近山中，若迎二人出山匡助國事，必有可觀。獻忠已知西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前在北京，為萬曆皇帝所隆重，為國出力，人所共聞。及聞吳尚書稱美利、安二司鐸係泰西學士，遂發命令，遣禮部之官往迎之。”^①僅言“極讚二位司鐸才德兼優”，將原先安文思謂吳繼善上書，“極端稱讚天主教義、他們兩人的修行和歐洲的科學”云云一段簡化，抹去傳教士藉此宣揚教義的痕迹。

關於利、安兩司鐸入見張獻忠的情況，“安書”摘要甚簡，“古書”則較詳。“古書”先記獻忠問兩司鐸以泰西各國政事，待之以上賓之禮，請其留駐成都以備顧問，並應許將來輔助教會，由國庫建修華麗大堂，崇祀天地大主，方便民衆敬神。隨言獻忠命賜各色綢緞數匹、白銀百六十兩及袍套各二件，司鐸始初以有礙傳教，未收袍套，但獻忠堅持非穿冠服不能入朝，只得接受。獻忠又賜徽號，稱二位為“天學國師”，欲謝辭，又未獲允，繼獲每月給銀十兩，禮遇甚隆：

一日，二位司鐸見官長到來，述明獻忠聘請之意，又見獻忠命令催促，不敢有違，遂同來使不分星夜趨赴成都。至日，天色已晚，遂宿祿署（按即“光祿寺署”），款以御宴。次日，由禮部長官引見獻忠。行禮後，獻忠問泰西各國政事，二位司鐸應對如流。獻忠大悅，待以上賓之禮，請二位司鐸駐成都，以便顧問。並令遵從己命，同享國福。且許將來輔助教會，國家太平之後，由庫給貲，建修華麗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國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鐸唯唯而退。此後，雖受獻忠優待，由庫給俸，如待上官；而所用一切，無非從儉去華，自甘淡泊，毫不濫用。

二位司鐸回署後，獻忠命某大員携點心各色、綢緞數匹、白銀百六十兩、袍套各二件，送至司鐸處。二位司鐸除未收袍套外，餘皆照華禮拜受。次日，入朝謝恩，訴明未領袍套之意，謂遠人職司傳教，已棄世榮，未便朝衣朝冠，有礙初志，婉詞謝之。獻忠云：“吾固知爾等是傳教司鐸，已絕世榮世爵。吾賜袍之意，是出自愛慕之誠，非有任官賜爵之心。然按中國風氣，凡入朝見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褻瀆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爾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又是西國學士，吾當屢次請見。若衣素服在王前往來，與朝臣不同，令人詫異，非吾尊敬賢人之心，亦非顧問員之所為也。爾等勿得推却”云云。二位司鐸見獻忠說得有理，又想獻忠如此尊敬西士，將來百姓見之，亦尊重聖教，異日傳教，勸人從主，決無如前時之難也。於是謝恩，領受袍套。

獻忠即賜徽號，稱二位司鐸為“天學國師”。文武官員，各皆道賀。二位司鐸答禮畢，即在獻忠前謝辭徽號，然終未獲允。又恐拂獻忠之意，只得謝恩而出。以後每人每月由國庫給銀十兩。二位司鐸見此厚禮，入內謝恩。並向獻忠曰：“我等遠人，深蒙不棄，屢承厚

① “古書”，頁20。利瑪竇司鐸傳記資料不勝枚舉。書目見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Tome I, pp. 22-42;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下冊，頁543-548；及 Erik Zürcher et al. eds., *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 1580-ca. 1680* (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1991), Chap. 4。小傳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72-82；及 Wolfgang Franke, “Matteo Ricci”,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s.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II, pp. 1137-1144。詳傳見裴化行 (Henri Bernard) 著 (1937)，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羅光《利瑪竇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及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Hall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4) 等。

賜，已慚愧無地矣。我等幼時矢志絕財，奉事天主，今在貴國傳教救靈，每月得其銀十中之一，已足養此殘生，每月無須厚賜多金，則蒙惠多矣。”獻忠曰：“爾等不必固辭，以顯吾之吝財。吾已爲王，不能招待二位西方大賢，區區之惠，何足掛齒，須當收納，不必固却。吾固知爾等無需銀兩，此不過聊表吾敬賢之心，非有以示富沽名而已。爾等當受之無却。”獻忠雖如此說，未知是否出自真誠。^①

司鐸報導在 1644 年冬至節，張獻忠在宮內大排宴席，彼獲邀請出席，獻忠坐於首位，次閣老，次二司鐸，然後爲獻忠之岳丈及百官各等級。筵間獻忠詢問二人教內事件，又詢西學、算學之事，隨與左右辯論，頗有心得。司鐸謂獻忠“智謀宏深，決斷過人”，又謂其“天姿英敏，知足多謀，才足以治國。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爲人主”。茲錄其記載如下：

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冬至節，大宴官僚。列筵豐美，堪比王家，賓客衆多，難以數計，二位司鐸亦奉命在座中。宴設宮內正廳，此廳廣闊，有七十二柱分兩行對立，足壯觀瞻。獻忠入席，請二位司鐸同坐。二位司鐸自謙，欲就末座。獻忠見之請云，吾友請升上座。獻忠首位，次閣老，次二位司鐸，再次獻忠之岳丈，餘則百官各按等級列坐。筵間，獻忠詢問二司鐸教內事件。並詢西學，問算學之事甚多。獻忠聞之，隨同左右辯論，頗有心得。其智謀宏深，決斷過人，二司鐸亦暗暗稱奇。獻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爲人主。席散之後，獻忠面許二司鐸云：“爾等現居署中，將來吾當爲爾等建築教堂，奉祀天地大主。”後六閱月，二司鐸上書提議修堂之事，獻忠置若罔聞，將書留中擱置。且此時獻忠欲離四川往陝西，以正帝號。先遣大兵往駐漢中府，以守川陝咽喉要地。^②

席散後，獻忠曾面許司鐸將來當爲建築教堂，奉祀天地大主，但其事並未兌現。張獻忠隨令二司鐸造天、地球二個，用紅銅爲之，另造日晷配合。二位經營此事，頗費心機，八閱月後始完工。獻忠見之，鼓掌稱善，厚加賞賜，但二人僅收銀二十兩、緞袍二件。自此獻忠對司鐸之才能益加敬重。“古書”描述云：

按二球之大，須二人圍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宮環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畜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國名、省名、城名與及名山大川，歷歷可數；經線、緯線、南北兩極與黃道、赤道、南北溫道，無不具備。至於日晷，列有黃道午線及十二皇宮與各度數，日月軌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實爲當時特出之物。見者莫不稱奇。獻忠尤爲稱羨，視若異寶。飭令將天、地二球排列宮中大殿上，以壯觀瞻。又令厚賞司鐸。凡官吏讚助天地球之工作稍有勞績者，皆蒙升官加級。獻忠深讚二位司鐸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獨愛厚司鐸，即司鐸之佣人亦均賜賞。司鐸因獻忠厚賜，推却不獲，僅收銀二十兩、緞袍二件外，餘皆辭謝。然司鐸等不戀世財，將所賜銀物施給教友及外教貧民。^③

①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pp. 360–361, 據 *Relação*, pp. 6–7; “古書”, 頁 21–22。

② “古書”, 頁 22–23。

③ “古書”, 頁 23–24。

“古書”稱司鐸謂“獻忠雖屬殘暴，虐待下屬，而對於司鐸殊為寬大，此乃上主特恩護佑所致……在成都屢見獻忠震怒，七竅生烟，人莫能當，無論官人、大小官吏，稍有不順，怒即隨之，或令絞死，或定斬決，或命凌遲碎剮，以緩斃命。種種虐刑，令人寒心。”又謂親見時任禮部尚書的吳繼善，奉命將馬匹給各士兵，以細故觸怒獻忠，即受虐刑斃命。又言某教友前在山東從龍各巴爾第神父（此即龍華民 Niccolò Longobardo, 1556/1559/1565 – 1655）司鐸領洗，時任軍官，為獻忠所寵幸，“因冬至節祀天，令讀祭文，未遵獻忠之意，因而冒犯，剥去衣服，受極重鞭打，血肉橫飛，痛極而亡”。^①按“安書”稱吳繼善之死與“古書”記述此次軍官之死因相同，其一必為誤記。“古書”復記某官得聞聖教道理，生愛人之心，見獻忠殘殺，心中不忍，遂上前善言諫阻，獻忠不聽，反將此官處重刑而死。二司鐸屢見獻忠殘害生靈，勸諫不聽，大為焦灼，謂處此驚懼危險中命如懸絲，一遇細故，即能斷決。又言獻忠殺人無算，屢自解云：“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而實愛之也。”此為張獻忠對殺人之故的一解說。

據司鐸言，“獻忠待人無恒，時而愛之，時而惡之，百姓官吏，多死非命。前日敬愛司鐸之心，復又轉愛為疑，或冤誣司鐸外順誠而內叵測；或疑司鐸別有貪圖，於國不利，於己有害。於是怒形於色，以待時機……司鐸溫恭謙讓，婉辭開導，而獻忠野心難化，喜怒無常。幸日間常思造天、地球之故，未害司鐸。”以下記述獻忠疑司鐸藏有天文書籍不肯獻出，不時大發雷霆，欲置司鐸於死地。按其書實為艾馬祿爾（P. Emmanuelis）司鐸所著之超性學書，講明天主教戒律，與天文學無關。及二司鐸解釋全書“皆論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當避罪惡，雖在罪惡危險之中，當獨向正道，方得永福。”獻忠聞之稱讚，因此釋怒：

二位司鐸溫恭謙讓，婉辭開導，而獻忠野心難化，喜怒無常。幸日間常思造天、地球之故，未害司鐸。一日，有管書太監某在獻忠前冤誣司鐸私存算學各書，並言有三大員可證。適二司鐸入內謝恩，獻忠見之，咆哮如虎，怒罵之聲，遠近皆聞，欲置二司鐸於死地。二司鐸駭極，以為死期至矣。幸獻忠見朝堂上有天、地二球係司鐸所造，頓念前功，不忍加害，怒容稍息。隨遷怒太監，將告司鐸之太監及太監所言之於證三大官，命推出斬之。二位司鐸在獻忠前代為邀恩，太監及年老之官一員蒙赦，其餘二官因他罪難逃，令就死刑。此後，獻忠疑二司鐸藏有天文諸書不肯獻出，不時大發雷霆之怒，欲置司鐸於死地。二位司鐸遭此委曲，不知已受許多謾罵，所幸者被誣時獻忠准其訴冤。

維時某官得有西文書一本，呈之獻忠（此是超性學書，俗名公義書。下卷論人事篇，係艾馬祿爾司鐸所著者。前時，利、安二司鐸遭僧黨之害，書籍各物均被搶劫，此書乃落入若輩手中故也）。獻忠以為此書即是天文書，隨即請二司鐸入內，笑謂之曰：“吾已獲天文書矣，請二位講與我知書中之意。”二司鐸一見此書，即知是超性學書。遂向獻忠曰：“大王以此為天文書耶？此非天文書，乃超性學書，其中並未言及天文學與日月蝕說。全書皆論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當避罪惡，雖在罪惡危險之中，當獨向正道，方得永福。”司鐸承獻忠之命，遂念書中一段，後譯成華文，獻忠聞之，大為奇異天主教誡律之聖，且讚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故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

① “古書”，頁24。龍華民司鐸傳詳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Tome I, pp. 58 – 66；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上冊，頁377 – 379；另參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96 – 98。龍司鐸生年有三種說法：1556、1559及1565。

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①

引文後段記載獻忠聞司鐸解說天主教誡之後，大為奇異，並稱讚其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認為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獻忠續言：“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顯然是故意將司鐸之解說扭曲，作為殄滅僧黨及世間定性為“惡人”的藉口及理據。

司鐸隨記獻忠大肆殘殺，據稱此時成都城中僧人多達二千之數，因獻忠慘殺，無一漏網者，而其餘住川中各州縣人民，亦多遭殺戮，因獻忠疑若輩所為為謀亂之尤，故下令剿洗。“安書”稱獻忠語於二司鐸，謂“天主遣他來四川消滅意欲殺害汝等之佛徒及刁民”，作為殘殺僧人的藉口。^②由於賊眾殘殺，各處川民皆舉義兵反抗，為家人親戚鄰朋報仇雪恨。獻忠見之，瘋病忽作，故發剿洗成都之令。“古書”稱“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獻忠欲剿洗全城居民，先暗遣一人捏詞誑報，以惑眾心。謂某路敵軍大隊將到，須當操練兵馬，以作禦敵之計。次日，獻忠暗將毒謀通知各營軍官，飭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詭言‘百姓等已暗通敵人之故，勾引大隊入川，以圖大舉，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秘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云云。眾官聞之，各自回營，預備明日大屠之事。剿後即當渡河，往迎敵軍。”^③以下詳述二司鐸的行動及其所見無辜百姓被殺，血流成渠的慘狀。司鐸為百姓哀求赦免無效，獻忠只下令免殺司鐸寓內人等而已：

次日，二位司鐸見軍隊紛紛出城，聚於平原，不知作何舉動，並不知昨日會議何事。後聞獻忠吩咐各官各保己家，否則妻氏兒女不保，俱遭屠戮。二位司鐸始知獻忠惡謀，於是急奔往寓所，欲救安當先生及佣人等。此時眾佣人勢難保存，因各軍人皆奉命認真嚴剿，毫不容情，凡城內居民一律殺絕。各軍分隊把守城門，餘軍驅百姓到南門就刑。時利司鐸在南門上，安司鐸在東門上，見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慘絕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急向刑官求赦，均屬枉然。

二司鐸各在一方，惶極恐極，慘悶欲絕。繼聞獻忠領馬隊將由南門往東門，二司鐸皆伏地哀求，情詞懇切，聲淚俱下，為百姓求赦，未蒙允准。後獻忠因知司鐸之請，免殺司鐸寓內人等，隨命左右傳命統兵元帥，飭令軍兵勿傷司鐸寓內之人，如寓內之人已被獲者，從速釋放。利司鐸得此赦令，以救佣之故，救了許多教友。安司鐸在東門，不知利司鐸已蒙邀允之事，終日在城樓上見無數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獲就刑，慘不忍睹，不時高聲痛惜云：“此等無辜之人，未必無一人救之耶！”不時見有教友被拘，押往殺場，尤為傷心，恨不能救，悲痛不已。

此時，被拘百姓無數，集於南門外沙壩橋邊，一見獻忠到來，眾皆跑伏地下，齊聲悲哭求救，云：“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何故畏懼百姓？我等無軍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敵，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

①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pp. 360–361, 據 *Relação*, pp. 6–7; “古書”, 頁 25–26。

②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pp. 365–362, 據 *Relação*, p. 11; “古書”, 頁 26。

③ “古書”, 頁 27。